

讀萬又煊教授再論國營重工業有感

王作榮
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

殘歲向盡，臘鼓頻催，正斗室靜坐，憶兒時故鄉年景，感垂老異地飄零，極目愴懷之際，臺灣經濟研究所劉泰英副所長送來萬又煊教授「再論國營重工業」一文，囑表示意見。經拜讀一過，實無法作答，僅能表示幾點觀感。

第一，萬文標題係「再論國營重工業」，但內容似未提及「國營」，「重工業」亦僅僅偶爾提及，而滿篇都是「鋼」。文章體裁也不是論文體，沒有「論」。所以文與題似未相對。

第二，全文氣勢很盛，充滿年青人氣息，文中曾有「以後如此隔洋論戰，固不可能。此次却決心奉陪」可謂年輕氣盛矣。至於說「瑞士不產鋼鐵，亦能出產精良紡織機及鐘錶」及「巴基斯坦在阿尤汗時代，已設鋼廠於七塔港」則真是小孩子鬬嘴格式，比年輕氣盛又進一步。

第三，做學問必須多讀書，多思考，尤其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士，更尤其研究社會科學中經濟發展問題的人士，更應如此。經濟發展問題涉及的方面太多了，包括文化背景、歷史淵源、社會結構、經濟階段、政治環境、時代潮流、國際形勢，以及偶發機遇等等，非博覽羣籍、知識廣博不為功。即以中日兩國為例，中日兩國差不多在同一時間維新，而結果迥異，豈止萬文所稱「鋼鐵工業之榮枯何可以道里計」但對於兩國何以有此差異的原因，因其牽涉太廣了，歷史家與經濟學家都不敢有定評，可見愈是了解問題的人，愈覺得自己所知有限難於下筆。也唯有這種人才有成為真學者的希望。

做學問也必須要多思考，我的朋友胡適之云云，固然極具權威，但我仍要分析、評斷、選擇，然後才能決定是否接受，接受多少。接受之後，還要經過我的消化、融會，變成我自己知識的一部份，用我自己的話說出來。權威云云，不過是我在融化、成長我的知識過程中，供我選擇攝取的材料而已。以印度的經濟發展為例，以印度那樣大的一個國家，那樣多的人口，那樣複雜的民族與語言文字，那樣僵硬的社會結構，那樣以坐牢與別人同情來作為復國手段的消極民族性，無一不是經濟發展的重大阻礙，其經濟發展之

前後，豈是區區所謂重工業政策，甚或設個鋼鐵所能解釋的。作為一個有思考能力的專家，一聽到這一理由，立刻便會想到其他的因素，也立刻會想到蘇俄、日本、韓國成功的例子，而表示懷疑態度，進一步搜集資料去研究室分析，然後下判斷。我當然可以引用別人的話，但那是因為他的歡然與我的一樣，而不是人云亦云，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。

我有幾個學生留美進修，成績都很優異，每次來信報告他們的心得時，我總是覆信反覆勸告他們要從沉潛上下功夫，要知道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」，要知道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」。唯有沉潛，才能多讀書，多思考，才能成大儒、通儒，而不是記問之學的知識販賣者；才能成家，而不成匠。浮躁是不能成大器的。我愛惜我的學生，所以我不怕他們不高興，時常直言告誡。

第四，我國對讀書人現在稱為學人、學者，古代則為士，而對士的要求是很嚴格的。士者，任事也，士是要做事的，而且要做大事。而做事則器識第一，學問尚在其次。所以說「士先器識而後學問」，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」。士要刻苦自勵，不能貪圖享受，所以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及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」，「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為士矣」。士要犧牲自己，服務別人，要對國家與社會有責任感，所以要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「士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」，即是遇到國家危險時，要犧牲生命去解救，而不是逃避；士遇到有利可得時，要想到是否合乎義，而不是見利忘義，一個國家士愈多，這個國家就會上正軌，愈強盛太平，而士是要長期培養的，訓練班祇能出幹部，不能出土；留學祇能出人，也不能出土，百年樹人，就是指養士而言。扶危濟傾，作國家之棟樑的是士，現在國家所最感缺乏的不是幹部、學人，是士，但願「天公重抖擻，不拘一格降士人」，則國家之幸也。

第五，凡涉及國家利益的爭論，我必奮筆直書。不怕得罪任何人。凡涉及個人意氣之爭，我從不理會。對萬文不作答，這也是理由之一。